

一抹茗香沁民心

——跨越千年的茶叶天路之旅



西藏易贡茶场工人在采摘茶叶(5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洒落大地，世界屋脊的藏族人家纷纷品尝起酥油茶，悠然迎接新的一天。

无论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甜茶馆，还是“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无不昭示着茶在高原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透过一缕缕茶香，仿佛可以听到茶马古道上悠扬的铃铛声。

茶香千载空悠悠

夜幕降临，藏东昌都市茶马广场灯光璀璨，醉人的藏歌回荡山谷。历史上，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进入西藏，昌都是茶马古道滇藏道和川藏道的交会点。

茶叶进入西藏历史悠久。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考古发现1800年前来自内地的茶叶等实物。西藏也流传着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以及小鸟衔茶为藏王治病的说法。

身处高寒地带的藏族人民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助消化、解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四川、云南等地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

清朝敞开对藏地茶叶的供应，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设立康藏茶叶公司，新中国成立前每年输藏

砖茶约30万条包。

然而，茶叶入藏并非易事。

2002年4月，记者在云南丽江见到时年76岁的宣绍武。这位走完茶马古道全程的老人当时说：“我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踏上茶马古道的，那年我16岁。给我的印象是，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险恶的道路了。”那时，每天出入丽江大研镇的马帮骡马就有300余匹，宣绍武曾亲眼看见过溜索的马夫肚皮被藤篾划破露出肠子的情景。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小河镇红星村甘溪坡，是背茶包进藏的必经之路。村旁的石路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拐子窝——背夫途中休息时，将丁字拐杵于石上支撑背架，日复一日，木拐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茶马古道既是历史上汉藏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纽带和象征。”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田茂旺说，英国殖民印度后，大规模种植茶叶，企图在西藏倾销。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展开了坚决斗争，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藏地。

一茶一叶总关情

在清晨的西藏城乡，伴随电动酥油茶机的搅拌声，浓浓的茶香扑鼻而来。

“过去用传统的木质酥油桶，打茶时需上下抽拉，费时费力。”81岁的确朗老人每当接过后辈们端来的热茶，总是

感慨万千。

在旧社会，确朗是一位农奴。在他的记忆里，农奴喝不到酥油茶。“即便是清茶也不敢放开喝，砖茶煮完再晒干，重新煮，要反复三四次。”

喝茶不再难，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后。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销茶的生产和供给，在四川雅安、云南下关等地建立专门的生产厂家，每年输入西藏边销茶10万至14万担。

新华社在1956年6月6日播发的《藏族人民今年将喝到更多更好的紧茶》报道中写道：紧茶（即沱茶）是藏族人民最喜欢饮用的上等茶，用它做出的酥油茶特别芳香可口。藏族人民把这种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紧茶称为“解放茶”。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李梅说，为让西藏群众喝上便宜茶，国家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

1965年，国家对边销茶价格进行调整，与1959年相比，价格降低50%。1988年内地调入西藏的边销茶提价，但西藏仍按平价销售，亏损由财政专项补贴。

在雅安茶厂，一款珍贵的茶叶样品至今仍被精心珍藏着。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在雅安茶厂订购40多万份“民族团结”牌的茶砖作为礼品，送给西藏每户农牧民。201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赠送的全自动酥油茶机以及精美的茶碗，受到农牧民欢迎。

根据西藏等地区成年人边销茶消费调查数据，西藏成年居民每年消费茶叶16.9斤，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千茶万茶雪域开

拉萨市北京路，岗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门店内，一些造型独特、包装各异的茶叶产品吸引着顾客。

在与之不远的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喜馬拉雅圣茶、藏地茶、墨脱茶……货架上琳琅满目产自西藏的茶叶格外显眼。西藏茶文化协会会长辜甲红说，西藏不出产茶叶的历史已经终结，现在西藏产的高原茶，开始销往内地。

易贡，藏语意为“美丽的地方”。沿着曲折的山路进入易贡茶场，潺潺水声在耳旁回响，绿色茶田、雪山冰峰不时映入眼帘。

自1963年开辟西藏第一块茶田，经过50多年发展，易贡茶场已是西藏最大的茶场。易贡茶场副场长才程说，刚开始茶场只试种50亩茶树，生产的都是边销茶；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模化生产边销茶和绿茶；2010年尝试生产红茶；近两年，在全国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网络销售已占销售总额的20%以上。

近年来，易贡茶场迎来发展黄金期。广东援藏工作队专门组建产销一体化团队，援藏技术人员驻点教茶农科学种茶，茶场细茶、边销茶产量分别从2018年5700斤、6万斤提升到2020年的2.1万斤、15万斤。如今茶场的茶叶品种达3大类26个，生产的云雾茶还在全国茶博会上获金奖。

高山云雾出好茶。在西藏墨脱县、察隅县等地，茶田纵横，茶产业作为西藏新兴的绿色产业，受到国内茶界的重视。

2019年，在云南种植茶叶近30年的民营企业家张延礼，把目光投向原始森林深处的西藏波密县。他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筛选培育茶树品种，研发高原古树茶种植加工工艺。这一年，张延礼开始从西双版纳移植15万棵大茶树，种植与西藏本土原生植物共生茶园2600多亩。

“世界屋脊洁净的环境、独特的气候资源非常适合种植茶叶，我们不仅要让西藏人民喝上更高品质的茶叶，而且要让各族人民喝上雪域高原的优质茶叶。”张延礼说。

西藏茶叶的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变化。西藏商务厅的数据显示，过去边销茶占西藏茶叶消费的98%以上；2000年以后，红茶、绿茶、花茶等逐渐流行，已占自治区茶叶销售的15%以上。铁观音、大红袍、云南普洱等名茶也不断进入高原市场。

茶，是饮品，又不只是饮品。它见证着千百年来西藏和其他地区的交流交融，也见证着中央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西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曹健 张京品 格桑达觉



专家建议开展科技攻关做强草种产业

我国草种业产业体系发展滞后，已成为草原生态建设和草业发展的突出短板。一些专家建议，应开展科技攻关，加强政策扶持，大力发展草种产业。

这是记者在近日举办的草种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说，近年来我国草种资源保护与利用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草种资源保护体系不健全。草种资源本底不清，珍稀特有种质资源丧失风险加剧。

——优良草种培育与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国草品种只有600多个，而美国登记的禾草品种就有5000多个。

——产业体系发展滞后。我国每年草种需求总量的30%需要进口，草原生态修复亟需的乡土草种生产尤其缺乏。

——草种管理不完善。我国缺乏有效的草种认证和乡土草种管理制度，草种生产、推广等环节存在不足，草种质量得不到保证。

“这些问题带来的生态安全和草畜产品食品安全风险日益严峻，必须尽快补上草种业这一短板。”他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认为，应加大草种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力度，加强草种种质资源保护，构建多层次收集保护、多元化开发利用的新格局。搭建草种育种研发平台，并不断提高乡土草种的生产能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建议，建立长期稳定的草种业资金投入机制，加大草种质资源保护、种子生产基地的投入力度，建立草种发展基金，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建立多元化投资融资渠道，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草种企业。

“企业是种业发展的主体，要围绕草种企业做大做强、做专做精，出台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蒋有绪说，要推动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激励有效、约束有力、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种业育种创新资源、人才、技术向企业聚集。

不少专家还说，要加强行业管理，推进草种管理法律法规制定和修订工作，完善草种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相关法律法规和种子检测体系，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草种行为。

新华社记者 胡璐



6月9日，在柳州市柳北区桂景湾路小学，80岁的老党员区焕章给小学生们讲述党史故事。

当日，广西柳州市柳北区桂景湾路小学举行党史教育进课堂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走进课堂，让学生了解革命故事，学习党史知识。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90后”村支书忙“三夏”

置了两个执勤点，由专人值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可以及时处置。”周伟贺说。

下午3点，烈日炎炎，32岁的党员王少贺正在西部固村北部的麦田中值守，一顶绿色帐篷、一张桌子、两个灭火器、一瓶水是他全部的装备。

“我下午2点刚过来，下午5点有人来换班。”王少贺说。

王少贺话音刚落，周伟贺率领的禁烧宣传车队停在帐篷前。30岁的党员刘帅，站在车上手持话筒，通过音箱，大声宣读“禁止焚烧秸秆，防治大气污染”的口号。

禁烧执勤卡点值班成了刘帅最近的生活常态。“乡亲们忙活了大半年，不能让一把火将麦子毁于一旦。”刘帅说。

作为全国小麦第一大省，河南当前麦收过半。随着农机装备水平的不断

提高，河南小麦收割、打捆、播种全部机械化，彻底解放了农民，收粮变得简单，保粮、防火、保安全的任务却越来越重。

“我们村‘两委’干部有9人，其中‘80后’‘90后’就有5人，青年是主力。”周伟贺说，正是这些青年村干部成了协调农机保粮食、组织禁烧防火灾、地头巡逻保安全的主力。

如今，河南全省像周伟贺一样坚守“三夏”生产一线的“90后”村支书有918名，其中滑县有14名，最小的仅25岁。这些扎根基层党组织的青年“领头雁”以实际行动助力“三夏”生产安全、有序。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截至6月8日17时，河南已收获小麦6682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8.6%，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4万台，日进度1047万清。

新华社记者 李鹏 孙清清

弘扬精神 振兴乡村

——4位脱贫攻坚领域党员代表共话奉献与奋斗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我虽然年近80了，但还要为菌草事业继续奋斗。”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坚定地说。

这是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外记者见面会的现场，包括林占熺在内的4位脱贫攻坚领域党员代表围绕“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绘就乡村振兴壮画卷”与记者们展开交流。

几十年来，为了让贫困乡亲能开拓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林占熺一直奋战在科技创新第一线。如今，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已发展成三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引领世界菌草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菌草技术已推广至全国31个省份500多个县，并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科技扶贫与技术援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理想，有信念，有实践，就有希望。

“书记城里来，满身扶贫经。走村又串户，带来新门路。”在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乡亲们山歌质朴，字字见情。

王泽勇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贵州省委国防工委委派的驻村干部，2016年4月担任水井村第一书记。多年驻村工作中，他强支部、兴产业，提出“果树上山、香葱进地、莲藕下田、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之路。

如今，水井村已蜕变为整村脱贫的美丽乡村。千亩荷花开，田园美如画，乡村旅游初具雏形，茶叶加工、藕粉生产线也已建成投产。村里人均收入从2014年的3000多元增长到2020年的1万余元。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扶贫干部们前仆后继攻坚克难，大家越战越勇。脱贫不只是去帮扶别人，而是我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并肩作战。”王泽勇说，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和全村百姓一起，为打造百姓富、生态美的美丽乡村而奋斗。

洒下多少汗水，就收获多少真情。在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道路上，无数共产党员顽强拼搏、接续奋斗。

“从陕西洛川到玉树囊谦，我在这块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第二故乡’度过了30年，从初到时的不适应，到渐渐熟悉、爱上、融入这个地

方，收获了当地藏族群众最真诚的友谊，这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扶贫开发局局长郭晓荣感慨良深。

郭晓荣在囊谦县有10多年时光在扶贫岗位上度过。有人叫他“精准局长”，因为对各种扶贫政策滚瓜烂熟，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有人叫他“较真局长”，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不干，让群众担风险的事不干……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当地老百姓住在了基础设施完备、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改变了以往行路、就医、上学、吃水的困难问题，日子越来越兴旺。

“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以后，党的惠农政策更多了，使我坚定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每当看到脱贫群众脸上带着幸福笑容的时候，我更加坚定了信心和决心。”郭晓荣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见面会上，奋斗与奉献、坚守与希望的感情，洋溢在党员代表们的言语之间。

“85后”的杨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陞乡江门村党总支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10年，她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江门村，带领乡亲们努力拔穷根。

多年来，她组织留守妇女成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动员大学生村官成立创业联盟，打造品牌，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带领农户种植特色稻米、高山水果和蔬菜等，并推动以“稻+鸭+鱼”共作模式进行种养。产业发展、脱贫增收……一系列成效，使她获得了村民的拥护。

“这让我明白了老支书多年前跟我讲的话——城里少你一个大学生不怎么样，村里多你一个大学生会不一样。”杨宁感慨地说。

未来乡村振兴怎么干？她满怀希望：江门村还是要走产业发展的道路。要依托原生态的资源优势，做大做强乡村民俗旅游和特色种养产业，走品牌化道路，继续做好高山泉水西瓜、林下竹荪、特色稻米等产业。同时，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电商直播带货，“以产业促增收，村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周圆 黄鑫

赤水河畔新“突围”

川南黔北，赤水河蜿蜒流淌。8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此突破围追堵截，完成了四渡赤水的伟大战略转移。80多年后，沿河干部群众又因地制宜，进行产业“突围”，推动乡村振兴。

“足足20年啊！”站在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双沙镇高坡上，俯瞰着连片绿色产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刘礼伦感慨道，“像我们的甜橙产业，经过很多挫折才发展起来。”

古蔺县赤水河沿岸上百公里，已发展20多万亩甜橙。这个绿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在发展甜橙之前，古蔺县还进行了其他产业上的尝试。

部分农技干部还记得，多年前他们常被村民调侃：“这是你们第五次来搞产业发展哦，到底搞哪样嘛？”

刘礼伦说，2000年左右，少数乡镇发展甜橙产业。“但村民认为，种一株两株可以，要大面积种，不行。”好不容易做通工作，老乡又不按要求栽种，苗子存活率不到10%。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我们邀请很多专家来考察研究，终于选到最适宜的品种。”刘礼伦说，一些乡镇甜橙产业的发展也有了起色，但尚未形成“燎原”之势。

在古蔺县太平镇九龙村，村干部曾带着村民外出考察甜橙种植。“考察时信心满满，回村后无动于衷。”村支部书记王安康说，大家担心市场问题。2015年，村里决定把返乡年轻人带出去考察，一回来就有人发展甜橙产业。如今，九龙村已发展起3000多亩甜橙。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王崇东为推广甜橙种植，常年在山上奔波。一次，他在山上摔了个颅内出血，休养几天后，放心不下甜橙林，又赶回赤水河边。王崇东说，老乡传统观念强，非要在甜橙苗旁种玉米，用来喂猪。

后来，王崇东让示范户带动，老乡慢慢接受了科学种植技术。“瓜果飘香，老乡富了，才不愧对这块红色土地。”王崇东说。

如今的赤水河畔，甜橙成为最重要的乡村振兴产业之一。

赤水河上游，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层层叠叠的甜橙林已挂满果实。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曾到达这里，他们与当地村民做年夜饭、开联欢会，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

难忘的春节。

在石厢子彝族乡堰塘村，村民彭中能在地里忙碌，为果树施肥除草。“以前到5月我们就没吃的啦，现在种3亩甜橙我一年收入好几万，在外打工的儿子有时还没我挣得多！”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老彭豆大的汗珠上，但他干劲十足，声音洪亮。

如今的石厢子彝族乡，已经发展起3000亩优质甜橙。当地老乡说，这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曾经落后的村庄早已变了模样。

赤水河畔的产业突围，成功的不仅仅是甜橙产业。

在古蔺县二郎镇，铁桥村村民王申高对种植红高粱越来越有底气。“过去种玉米，收入少。”种了5亩红高粱的王申高说，去年村里合作社和酒厂达成协议，以保底价收购，他的收入比过去翻了两番，超过一万元。铁桥村村支部书记赵领说，全村600余户村民中，已有500多户种上了红高粱，面积逾千亩。

古蔺县白马村的蔬菜种植业主左尚君，也曾经历了一场属于他的“突围”。2014年，由于不了解市场行情，他种的1200亩儿菜迟迟没有销路。“七公里河坝全是儿菜，最后全部烂在地里，我不知哭了多少回。”如今，左尚君不仅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建起稳定的供应链条，还正在修建一座可存储200吨蔬菜的冷库，“以前那种事再也不会发生。”

赤水河畔，甜橙、红高粱、特色蔬菜……一个个绿色产业在近年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

当地干部说，产业突围必须实事求是，要像红军四渡赤水那样根据实际，找准突破口。以古蔺县为例，当地利用有利立体气候，在海拔700米以上发展甜橙产业，在700米~900米发展桃李种植，在900米~1100米发展猕猴桃，1100米以上推广中药材种植。

“产业突围成功，是因为我们有许多不怕困难、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时任古蔺县委副书记曾霖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病倒的、牺牲的干部，不在少数。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新华社记者 周吉相 陈地 胥冰洁

乡村振兴